



中国现代名家经典书系

小说精选

张秀枫 主编
吴景明 编选·注释·导读

沈从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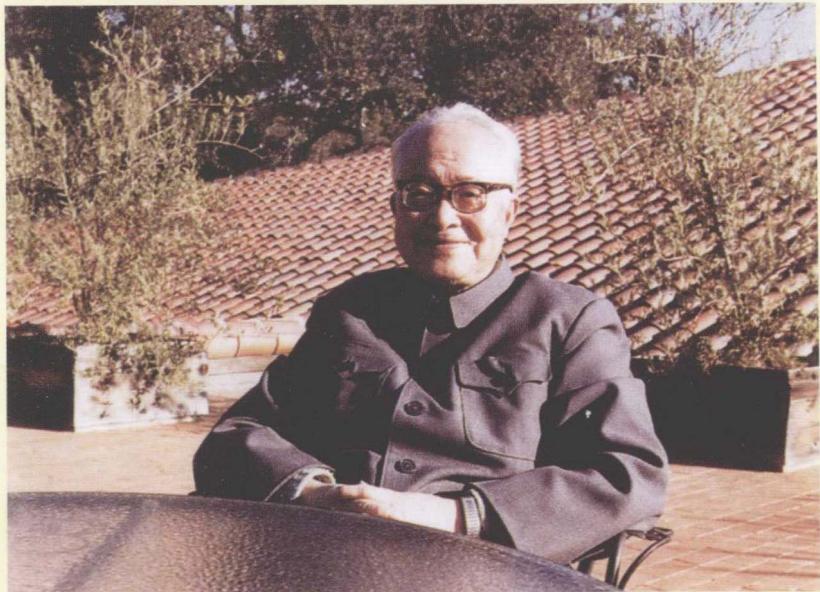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青年沈从文。



1961年，沈从文在江西。



1981年2月，沈从文在斯坦福大学。



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



沈从文的母亲黄英。



辛亥初家中亲眷合影。后排右起：满娘、大姐、大娘、母亲、岳萌、二姐、外祖母永玉太、黄表嫂、大哥。前排：得余、从文。



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
1934年合影。



抗战时期沈从文一家在昆明乡下。



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
长子龙朱及九妹岳萌1935年
在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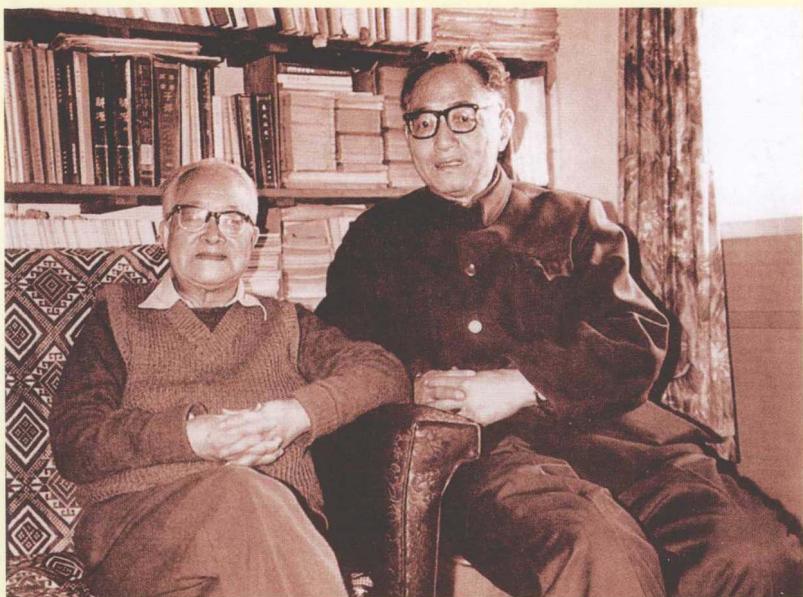
1954年与夫人张兆和、次子虎雏在家中。



与汪曾祺合影。



1975年春节，在北京罐儿胡同中央美院宿舍，和黄永玉合影。



1982年初，与来寓所访问的金隣教授（英文版《中国土地》译者之一）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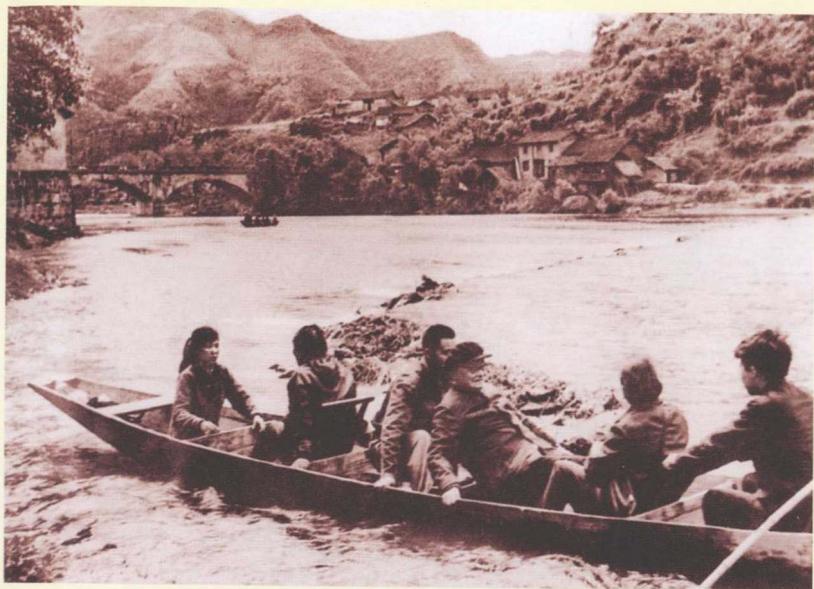
1984年3月28日与《从文自传》德文译者、汉学家马汉茂合影。



1982年黄永玉陪沈从文重访母校。



在凤凰县文昌阁小学教室里。



1982年5月沈从文乘小船重游家乡的沱江，正在顺流下一个小腿。

10年后，沿同一段小路，他的骨灰一部分洒入沱江，另一部分埋在此处对岸山腰。



1984年1月9日，在寓所与《从文短篇小说集》德文选译者吴素乐女士合影。

导 论

吴景明

沈从文（1902—1988），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湖南凤凰县（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1917年8月至1922年入伍当兵，浪迹于湘川黔边境地区，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并开始接触中外文学作品，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1923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以写作谋生并自学。1928年至1949年，先后在上海中国公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并兼任《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1949年以前。从1924年，他第一次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第306期发表《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开始，一生创作结集八十余部作品，是中国现代多产作家之一。新中国建国后主要从事文物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50年至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1978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1988年，病逝于北京。著有历史学、考古学著作《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等，特别

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沈从文的声誉或许是中国现代作家中起伏最大的一个。三四十年代，他被视为北方文坛领袖；40 年代末，因左翼阵营指斥其为“桃红色作家”而退出文坛，长期被历史尘封；六七十年代内地学术沉寂之时，香港和海外的沈从文研究，在王润华、司马长风、夏志清等学者的耕耘下，一直薪火不灭。80 年代中期以降，以凌宇等为代表的大陆学者的沈从文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取得了突出成绩。海内外学者丰富的研究成果，为 90 年代后期沈从文文学史地位的直线上升作了必要的学术准备。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现代作家重新评价潮流的兴起，20 世纪末，催生了一个独特的学术现象：作家排座次。在文学史的序列中，给予沈从文明确崇高地位的，金介甫是第一人。1994 年，王一川主编、海南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以“文学大师”标目，沈从文位列现代小说家排名第二，仅次于鲁迅。1996 年 6 月，《亚洲周刊》推出的由海内外著名学者和作家参与投票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鲁迅以小说集《呐喊》位列排行榜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但如果以单篇小说计，《边城》则属第一。早在 30 年代中期，沈从文就颇为自信地写道：“说句公道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办法拒绝。”（《从文家书·湘行书简》）六十多年后，沈从文的预言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认可，当然，这一评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认识并不一致。

沈从文文学创作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小说和散文方面。从 1926 年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开始，至 40 年代刊行的沈从文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

《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中篇小说《一个母亲》，长篇小说《旧梦》、《长河》、《边城》，散文集有《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沈从文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由于沈从文的故乡凤凰县处于湘西沅水流域，是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域偏远，文化落后，丰富的乡下经验，熟悉的湘西风土人情，这些边地生活和民间文化构成了他创作的最重要的源泉，特别是故乡的河流沅水及其支流辰河，在沈从文的创作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成名后的沈从文常自称是“乡下人”。“乡下人”不仅是沈从文对自己身份的自谦性的体认，同时更凸显了他的经验背景、文化视野、美感趣味和文学理想。

自沈从文踏入北京城的那天起，就决定了他不可能是个原生态的乡下人。进入都市之后，他已经成为一个拥有乡下人眼光的都市知识分子，五四的启蒙思想和西方文明的洗礼已经使他深切领悟了宗法制农村自然经济在近代解体的历史过程。沈从文对都市一直没有太多的好感，他认为城市文化是一种扭曲人性的、虚伪的、做作的畸形文化，有悖于人性的正常发展，与湘西自然纯朴的民风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以“乡下人”的情感选择，以都市人的理性认知来审视当时社会的城乡状况，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湘西宗法制社会初始阶段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对乡村生命形式美丽的赞美及与其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的合成显示了沈从文全部作品的张力。情

感同理智的矛盾与冲突使他成为中国农村传统宗法制社会的歌哭者和中国现代城市文明的批判者。

沈从文的作品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以湘西社会为基石，精心构筑理想的人生形式和生命形式，是沈从文创作的鲜明倾向。弘扬人性的真善美，表现为对理想的向往；揭示人生的扭曲和堕落，表现为对现实的执著，这两个方面是沈从文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他的文学创作的全部理想就在于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在小说创作中，沈从文首先在其湘西小说中通过建构理想的人生形式和展示现实的人生形式来描绘一个“乡下人”的梦想。

沈从文理想人生形式的构建方式，一是基于民间传说的理想人生形式建构。《龙朱》、《神巫之爱》、《媚金·豹子与那羊》等小说在浪漫主义的格调中回荡着历史的悠长余音。涂上了理想化的色彩，寄托了作者对具有悠久历史和风俗传统的苗族人民的挚爱以及对原始生命形式的礼赞。二是基于湘西世界完美人生形式的再造。出于对现实人生形式的不满与厌倦，沈从文在回忆中构造着牧歌式的“边城”世界。《更夫阿韩》、《炉边》、《我的小学教育》、《在私塾》、《入伍后》、《卒伍》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不仅具有作家自传的性质，更在展示湘西童年生活时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人生理想，是表现人性美较为突出的作品。而中篇小说《边城》则把这种审美倾向与艺术追求推向顶峰。

沈从文的湘西现实的人生形式体现为对湘西自在无为人生形式的表现和在城乡冲突中湘西儿女的价值固守。他以冷静客观的笔法表现了湘西底层人民古朴和谐、乐天安命的自在无为的人生形式。《牛》、《贵生》、《丈夫》、《菜园》等，倾注了对湘西劳动人民穷苦命运的同情；《萧萧》、《夫妇》、《雨后》、《柏子》等，

则以青年男女的性爱作为切入点，表达完美人性的理想。其性格共通之处是湘西山民的纯朴善良与蛮悍粗野。作者关注的不是人物性格自身的完整与丰满，而是变与不变中普通人坚忍顽强的“求生”努力和他们世代相承的命运与人生形式。庄严与悲凉，“野蛮与优美”交织在一起，传达出一种淡淡的悲凉与惆怅。城乡冲突中湘西儿女的价值固守也是沈从文面对战乱中的湘西的人生形式所做的思考。在乡村与都市的交响中，虎雏从乡村社会来到都市世界的结果，表明了“文明”征服“野蛮”的失败，以及“人性”的永恒（《虎雏》）；《会明》中的会明，时刻以“乡下人”固有的眼光看取战争与人生，以“乡下人”固有的生活准则对待变化的外部世界。作者充满热情地肯定了体现在会明身上的乐观、忠诚、正直、和善等现代社会所缺少的优秀品质，同时也不无同情地写出了会明身上琐碎可笑的一面。

其次，沈从文在他的都市题材小说中通过都市现实的人生形式，在与乡下现实人生的互补中来表达一个城市知识分子对人性的拷问。“乡下人”的现实人生与都市现实人生构成了鲜明的对照，作者在欣赏和赞美湘西山民纯朴善良的品格的同时，也揭露了远离“边城”的都市人的道德堕落和人性沦丧，鞭打了都市上流社会及家庭的无聊甚至糜烂的生活。其中包括“绅士淑女”们精神的空虚与生活的糜烂（《绅士的太太》）、都市爱情的自私与恐怖（《都市一妇人》），以及对高级知识分子作家、学者、教授等人的嘲讽，他们的虚伪、怯懦与自私（《八骏图》），无情地撕下了城里人的道德面纱，作品力图从人性道德的角度切入都市人生，反映上流社会人的本质的失落与人性的扭曲，揭示出都市人生的荒唐与可笑。

在沈从文的散文创作中，1931年8月写成的《从文自传》是传记体散文，记叙作者离开湘西前二十年的生命历程。沈从文的

学生汪曾祺说《从文自传》是“一本文学自传。它告诉我们一个人是怎样成为作家的，一个作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接受哪些‘教育’。”（汪曾祺：《与友人谈沈从文》）这是作者在30岁的时候，通过对“读一本小书又读一本大书”的回忆（《从文自传·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进行的自我寻找和确认。

1934年1月，因母亲病重，沈从文回到了阔别十几年的故乡，和夫人张兆和每日通信的基本内容，构成了他的散文集《湘行散记》。1937年底，抗日战争爆发后，沈从文第二次回到故乡，这次的经历和见闻，写成了散文集《湘西》。

《湘行散记》和《湘西》是作家两次还乡的思想结晶，也代表了沈从文散文的最高成就。如果说，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我们听到更多的是沈从文赞叹理想的湘西“人性美、人情美”的歌声，那么在湘西散文中，渗透于文本之中的则是沈从文面对现实的湘西而发出的酸楚的呜咽。无论是在鸭窠围的船上聆听长河、长夜与长歌（《湘行散记·鸭窠围的夜》），还是在箱子岩（《湘行散记·箱子岩》）感受15年前的鲜艳明丽和15年后的破败萧条；无论是对常德各种船只和船户的描写（《湘西·常德的船》），还是对凤凰的极少数女人的行巫、放蛊和落洞背后的神秘及凤凰大多数男人游侠者精神的追怀（《凤凰》），在这些人生现象里，作者不仅感受到了湘西社会生活乃至人类生活表层的悲惨与凄凉，更越过这表层的血与泪，体验到了他们被迫接受摊派到自己的那一份命运时，在日月交替中各尽生命之理的人生庄严。

湘楚文化的熏染、意境的创设、心理透视的方法和文体的革新是沈从文文学创作独具艺术特色的四个方面。

湘楚文化的熏染。一部湘西的历史，是一部土家族、苗族、汉族三族关系互动的历史。滥觞于西周、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

楚文化是湘楚文化的源头，而湘西闭塞的特殊地理环境正保留了部分楚巫文化的原生形态。这个文化体系残存着强有力的巫术宗教，充满着奇异想象的神话传说。沈从文的短篇小说《龙朱》、《月下小景》、散文《凤凰》等作品，均以苗族或南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习俗为依据，展现了楚地信鬼好祠，巫风繁盛的民俗民情。即便是《边城》这样的田园牧歌式的小说，也有苗汉文化冲突及巫楚文化的淡淡背影。

意境的创设。沈从文的乡土题材小说有意借湘西的原始神秘性和特异性来完成自己作品的构图。在人生场景的布置上极有暗示性，常常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种是意象内涵的有意“模糊”。如《边城》中翠翠父母爱情悲剧的底蕴，作家并没有明确交代而留下想象的“空白”。另一种是在物境上，不落痕迹地揉进自己的主观情愫。作家的主观情感随作品中人物的情绪游走，将自然景物人格化，使之与人物的命运和情绪相契合。把一种淡淡的忧郁、远远的愁绪，挟裹在平静的叙述里，在微笑的叙述中潜藏着悲哀，形成独特的抒情风格。

心理透视方法。沈从文是一个“对一切无信赖”却只信赖“生命”的作家。而生命，在他的思维中，主要表现为人的精神生活。他的都市讽刺作品，揭示了上流社会的病态精神特征；他的湘西小说，写出了“乡下人”的复杂心理结构；那些抒情散文更是人物内心活动的描绘，以此来表现人的心灵对外界的反应，同时传递了作家体味到的某种人生情绪。因此，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各流派如印象主义、潜意识和变态心理描写等因素，都化为了他作品的血肉，从而使他的一些作品带有心理小说的特征。小说《贵生》中，作者描写贵生在心爱的姑娘金凤被地主少爷迎娶成亲的当晚，听到伙计放纵粗野地议论新娘表现出的复杂心态，是通过咬唇、捏拳、端碗、喝酒等行动表现出来的。

散文《凤凰》，以封建宗法制度下妇女在婚姻问题上精神受压抑，导致心理迷乱，来解释“落洞少女”这一特殊人生现象。至于《边城》中关于青春期少女翠翠的心理透视，更显示出作家刻画人物心理的高妙。

文体的革新。在文体方面，沈从文是个永不知疲倦的探索者。其作品呈现出因不断创新而形成的文体多样化特征，这主要反映在不仅作品开头的形式多变，而结尾更与文体内在结构相呼应。沈从文小说创作初期，曾有意地运用各种体式包括日记体、书信体、游记体、寓言体等来创作小说，力图通过各种文体的练习，在实验中求得进展。创作进入成熟期后，初期小说文体形式的外部变革即为作品内部组织的变化所取代。这种变化表现为小说结尾的安排上。在他的作品中，结尾有“煞尾”和“度尾”两种。“煞尾”“如骏马收组，忽然停住”；“度尾”则“如画舫笙歌”，由远及近后又由近去远。《牛》、《贵生》、《丈夫》等小说的结尾都是极好的“煞尾”，小说往往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作者总以要言不烦的文字点出，一经点出便戛然而止。而《萧萧》、《边城》等作品的结尾则属“度尾”。《萧萧》从唢呐声中开始萧萧的出嫁，又在唢呐声中迎进萧萧儿子的童养媳的过门。《边城》的结尾是很凄美的。悲剧的尾声是在一个雷雨交加之夜，摆渡老人在操劳担忧中去世了，只剩下孤苦伶仃的翠翠在摆渡口苦苦等着情人二老来接她，而“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无论是对湘西人生的展示还是对都市众生的冷观，沈从文所提供的审视城乡文明的姿态和立场，是任何人所无法取代的。正如沈从文所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湘西这块神奇的土地，因有了沈从文而以一个无比纯朴的、自由的、满溢了生命力的王国出现在世人面前，沈从文更因而成为湘西人民情绪的表达者和歌哭者，他本人也正是湘西的魂魄所在。